

中国深化改革已箭在弦上

周子勋

9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将继续持续发展之路》指出,中国将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中国将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中国新一届政府今年3月上任伊始,就明确提出把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作为施政目标。中国已经不可能沿袭高消耗、高投入的老旧模式,而是必须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深化改革仍是持久动力。我们已经并将进一步通过简政放权,推进结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办的分给社会,政府该管的管好。

部际联席会议 做顶层设计

毋庸讳言,中国深化改革已箭在弦上。日前,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牵头建立涉及35个部委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协调经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和论证方案,并成立跨部门的经济改革工作小组。“部际联席会议”成为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机制。

虽然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超过30年,但是如何在各个领域上深化改革还存在着不同声音。在11月份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外,研究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重大问题是另一项重要议题。在刚刚结束的G20峰会中,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我们正在就全面深化改

革进行总体研究,以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加社会创造活力。据悉,由有关方面专家和智囊组成的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工作组,近几个月已在几乎全封闭的状态下工作,将各领域改革内容的不同意见进行磨合,然后呈交中央政治局审批。从习近平披露的内容来看,深化改革确实涉及各个方面。习近平指出,中国将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宏观调控、财税、金融、投资、行政管理等领域体制改革,将努力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和深化涉及投资、贸易体制改革。

毫无疑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建立“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是为了配合深化改革的工作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是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道路,不改不行了。中央加快改革的原因,主要是现有的一些体制问题极大地影响到经济复苏,在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减速的背景下,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央新领导层对于改革的危机感在增强。

改革有望进入新阶段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有分析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强调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有可能打出一面“建立规范、高效、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旗,这不仅与十八大提出的小康社会和“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相呼应,还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的说法完全吻合。

一个重要信号是,时隔29年后,被誉为推动中国改革接地气的莫干山会议再度重启。9月7日,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财政部科研所联合举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在浙江省莫干山开幕,这被称为第三次“莫干山会议”,本次会议重点关注当前中国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财税体制改革问题。令人关注的是,三次莫干山会议,恰逢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次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而此次莫干山会议由于产生多项重大成果被写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内容而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一面旗帜;第二次是十八大召开之前;这一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每次都赶在历史的窗口前召开。而这一次,在经历了中国在改革上的蹒跚不前后,中国社会迫切希望翻过不变的一页,期望看到改革再启动的新阶段。

事实上,观察以“习李”为代表的中央新领导层近年来的执政方式和工作重点,可以看到,他们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打出了反腐败的大旗,通过打“老虎”和“苍蝇”,为改革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李克强总理选择了政府改革,试图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通过向市场放权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化来激活面临转型压力的中国经济。如果基于这些出发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本届政府甘愿承受经济显著放缓的代价和风险,也要推动经济转型的改革;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经济放缓、流动性减少的时候,仍然不为市场所动而坚持在货币政策上按兵不动。

改革进程 要兼顾多种平衡

不过,应该看到,改革趋势只代表了必然性,而对于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来说,还需要有坚定的改革者克服困难,推动中国各项改革向深水区前进。目前,新领导层在改革上面临挑战,比如,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和轨道、中国逐渐固化的利益集团格局等等,这些因素不是在短期内就能迅速更改的,而是很可能需要以十年之期来谋划和推动。因此,在复杂的形势下,一个可持续的改革进程,不可能是单兵突进的,而是要兼顾很多的平衡。这种平衡会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产业升级与保证就业的平衡,腾笼换鸟与维持产业基础的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发展金融业与发展实业的平衡,扭转“债务经济”模式与维持适度负债的平衡……把握这些方面的平衡,需要兼顾多种利益,保证改革的可操作性与可持续性。在一个复杂的系统改革中,如果在某些方面单兵突进,甚至极端化,那就很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并给改革带来大量的阻力。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需要在各自领域内形成改革的合力,从上至下,进行系统的、有序的改革。只有当改革者不再孤军奋战,改革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焦点 评论

房租连续43个月上涨



城市房租连月涨,蜗居群体忧心慌慌。住房租赁不规范,土地供应偏紧张。就业扎堆大城市,发展冷落小地方。政策预期很混乱,楼市岂能不疯狂?

赵顺清/图
孙勇/诗

建立优先股制度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皮海洲

近日,证监会在回复有关全国人大代表关于优先股问题的提案时表示,建立优先股制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开展试点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证监会正抓紧起草并尽快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组织梳理和修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业务规则,为推出优先股排除制度性障碍。

受该消息影响,优先股再次成为日前市场关注的焦点,周一,以银行股为代表的金融股整体大幅上扬。

应该说,建立优先股制度确实是中国股市的当务之急,不过,优先股制度如果只是为了给了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提供便利的话,那有可能是优先股制度的一种扭曲。比如在股市行情看好时,上市公司发行普通股再融资;在股市行情低迷时,发行优先股再融资。如此一来,优先股反

倒成了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一把利器。这不应是优先股制度建立的初衷。也正因如此,为防止优先股制度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使优先股制度不再烙下圈钱的印记,建立优先股制度有必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优先股制度要优先运用于IPO改革,这是中国股市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IPO一直处于暂停状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的正式稿一直没有发布出来,根据证监会的表态,新股发行制度还在研究完善之中。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对IPO改革《征求意见稿》存在很大的分歧,被认为“未做根本性变革”。这其中就包括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比如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不仅导致大小非套现压力大增,而且也导致IPO“三高”发

行,上市公司股价高估等。而优先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方。比如,规定IPO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30%(指非国有控股公司),超过部分全部转为优先股。如此一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这可以说是优先股制度对于中国股市的最大贡献。

其次,优先股制度必须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而不是一种选择性制度。即IPO公司必须执行优先股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选择的。不执行优先股制度,IPO公司就不符合上市条件。当然,这一条款对于已上市公司并不适用。对于已上市公司来说,只能是鼓励大股东将过多的持股转为优先股,但却不能强制执行,其效果预计较为有限。

其三,优先股制度推出初期,鉴于目前A股市场大小非套现压力巨大,故优先股原则上都设计为不可转换优先股。

即优先股只能由上市公司赎回或由投资者长期持有,而不能转换为普通股上市流通。

其四,优先股股息率要合理。优先股的股息率通常是固定的,投资优先股的投资者往往可以获得相对固定的投资回报。不过,优先股股息率的确定一定要合理。如果股息率太低,对于投资者没有吸引力,这不利于优先股的发行;如果股息率太高,这又容易损害普通股股东的利益,甚至成为向优先股投资者进行利益输送的一种手段。

此外,将优先股制度运用于再融资时,有必要对上市公司再融资制度进行全面的完善。尽量避免上市公司在股市行情看好时发行普通股再融资,在股市行情低迷时发行优先股再融资这种“全天候式”再融资的做法。此外,不重视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应该不能通过普通股的方式再融资。

乐见温州楼市成为风险样本

宣宇

当前温州正在经历着剧烈的楼市风暴。由于房价持续下跌,温州房屋成交价不足偿还银行贷款的“倒挂”现象愈演愈烈。据报道,一些之前高位买进的商品房价格如今仅高出银行最大贷款一两成,若房价在现有基础上再降10%左右,理论上这些商品房将陆续面临“倒挂”风险。报

道援引一位温州基层法院副院长的话说,自2011年民间借贷危机以来因银行起诉被该院查封的房屋超过3000套。温州房价调整促发的个人“弃房”或“跑路”案例,已引起舆论对社会信用风险的普遍担忧。

有舆论认为,温州应该进行政策调整以阻止房价下跌甚至促成稳中有涨,以消除银行房贷风险和保全社会信用体系。无疑,这是一个办法。但遗憾的是,这是以往房价屡调屡高逻辑下的心理惯性,也是投资者、担保者及相关银行敢于不顾投资的风险天性、大资金高杠杆投资炒作房地产的心理盾。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敢做且做得越大,政府就越不敢严厉调控,否则房价深跌的后果大家都背不起。这种博弈心理是中国房地产调控的巨大障碍,时刻考验着调控政策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中国楼市调控中道德风险的严重性可见一斑,但新一届政府已表现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结构转型升级的不同寻常的政治决心,这可能会让这些投资者的如意算盘失算了。

房子是中国百姓消费规模最大的单项商品,2012年商品房销售额达6.4万亿,房地产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例高达34.2%,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巨大的居民财富“吸尘器”,把中低收入阶层老百姓的财富基本吸光了,甚至变成房奴。房地产业投资品属性的畸形膨胀和以房地产为枢纽的居民财富——政府投资转化模式已严重阻碍了新形势下内需增长为方向的经济转型升级。

在中国经济面临内外多重压力下,结构转型升级、改变旧的以房地产投资为枢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迫在眉睫,坚持楼市调控不仅仅是新一届政府的民生和政治自觉,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必须跨越之痛。温州房价出现深度调整是本轮调控的积极成果,改写了此前中国楼市投资只赚不赔的传统。

笔者认为,如今的温州楼市已经成为中国房地产投资风险教育的最好样本,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口,温州楼市的调整阵痛对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深远意义。

首先,温州楼市高台跳水造成断供和弃房现象确实有所增多,但引起局部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不大。占比较大的刚需和改善型购房贷款杠杆率低,信贷质量较好;产生“倒挂”的房源主要出现在之前炒作的高端物业中,炒房资金基本来自各种渠道的银行贷款,但对于这部分风险,贷款的绝大部分还是能被房子覆盖的。一般房贷评估价按成交价八折、最大抵押贷款按七成计算,可贷款额为房屋成交价的56%,即使个别豪宅价格腰斩,房贷的大部分仍被覆盖。

与2010年调控前比较,今年7月份温州新建商品房(不含保障房)价格平均下降17.9%,对于那些跌幅较大的新建商品房,价格比最高峰时下跌了30%-40%。因此,即使出现“倒挂”现象,银行贷款的绝大部分还是有保障,不会引发局部金融风险。另据温州银行界人士表示,纯抵押贷款出现“弃房”情况比较少,更多出现在“抵押+担保”贷款环节,这部分贷款总的占比要更小些。

其次,温州楼市风险暴露有助于逐步化解房地产系统性风险。中国房地产业到底有多大泡沫仍有许多争论,但一个基本共识是,热点地区房价太高了,已远远超过普通居民购买力。在房价单边上涨的情况下,大量其他产业部门资金游离到房地产业,担负储蓄-投资转化器的房地产业在不断固化房地产及相关传统产业的枢纽作用,严重阻碍了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性企业(例如央企)均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涉及房地产业,而那些可能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型战略产业因风险大、前期投入多回报低,面临严重的资金和制度短缺。一方面是房地产价格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一方面是新型产业裹足不前,经济发展潜力受到严重威胁。这种情况下,快速上涨的房地产价格终有一日将失去经济和收入支撑,房地产业乃至整个金融系统性风险也越来越大。如今,温州楼市风险提前暴露,是中国房地产业回归健康发展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经的坎,也给如今频出的“鬼城”、“空城”敲响警钟。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ll18@126.com。